

佟飞 石火

河南人民出版社

怪杰
东方

冯玉祥

责任编辑 张励中

东方怪杰冯玉祥

佟飞 石火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32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940册

ISBN 7—215—00054—0 /K·17

统一书号11165·193 定价2.40元

319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4)
家世与童年	(4)
行伍开始	(10)
第二章 从小兵到将军	(16)
苦读带来的升迁	(16)
发动滦州兵变	(20)
白朗起义与十六混成旅的建立	(27)
第三章 叱咤风云的年代	(35)
捍卫共和反对复辟	(35)
反对武力统一	(43)
驻军常德	(49)
直皖战争前后	(57)
督陕督豫	(60)
陆军检阅使	(67)
北京政变	(75)
基督将军	(92)
西北边防督办	(99)
赴苏联考察	(114)
五原誓师与解西安之围	(118)

东出潼关与会师中原	(128)
冯之治军特点	(134)
第四章 曲折的道路	(152)
反共倒退	(152)
反蒋战争失败与西北军瓦解	(163)
第五章 人间重晚晴	(182)
“九·一八”前后	(182)
抗日同盟军	(188)
泰山读书	(201)
共赴国难	(208)
八年抗战	(217)
冯玉祥的丘八诗	(230)
为和平奔走 为民主献身	(246)
附：冯玉祥将军大事年表	(268)
附件一：周恩来：《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290)
附件二：《冯玉祥回国宣言》1926年	(292)
附件三：冯玉祥在胶东掖县中学的《演说词》1934年	(297)
附件四：冯玉祥《告全国同胞书》1947年	(300)
附件五：《我为什么与蒋决裂》1947年	(305)
附件六：冯玉祥的遗嘱1948年2月10日	(312)
附件七：李德全：《冯玉祥先生遇难经过》1949年	(316)

前 言

1946年的9月，在烟波浩淼、碧海蓝天的太平洋上，暮年的冯玉祥将军在赴美途中的美琪号邮轮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不禁感慨地吟诵出王阳明的一段散曲，谓：

宦海茫茫，京尘渺渺，碌碌何时了，风掀浪又高。覆辙翻车，是谁颠倒，算来平步上青霄，总不如早泛江东棹。

乱糟糟，鸦鸣雀噪，恶狠狠，豺狼当道。竭尽民膏，怎忍闻人哀号。举疾首蹙额相告，辫纓满朝，干戈载道，等闲间把江山送掉。

平地发生祸苗，昧天良哪讲公道。抛去纱帽如蒿草。本待要竭忠尽孝，只恐怕狡兔死走狗烹，落了韩信的下梢。

（冯洪达：《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58页）

冯将军回首前尘，在乌烟瘴气的中国上层社会，如段祺瑞、张作霖及蒋介石之误国殃民，以及个人奋斗终生之被放洋去国，不无感慨。然而综观冯之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可喜的贡献，因而受到人民的爱戴，那也是能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结果。今后何去何从恰如大海的烟波，淼渺无际，然而作人之本却已智珠在握，用自己的行动来书写最后的篇章了。终于在1948年7月踏上了归国的新征途，为国民党爱国人士走国共合作道路树立了

光辉榜样。

早在1920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就体现了他断然决定“自民国九年12月15日起，即抱定坚忍吃苦”的决心（《冯玉祥日记》1920年12月14日）在泰山读书时又说：“我平素主张提倡节俭，痛斥奢华，五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冯玉祥读春秋左传札记》自序）这与冯将军一生的性格与生活实践，都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始终。这绝不是什么生活细节，那些把生活问题看得微不足道的大人先生们，恰恰是在这里跌下去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比比皆是吗？而冯将军能在那个人欲横流的岁月，历经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等数代反动统治，却能“出淤泥而不染”，难道不是奇迹吗？他正是以特立独行的风骨，在中国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影响着当世和后世，尽管他在政治上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甚至有时倒退，但在统治阶级当中，他仍确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王震同志所讲：“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分析，包括肯定统治阶级当中一些人物的杰出作用，这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结论并不矛盾”。（王震：《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载《红旗》1982年第二期）

冯玉祥将军的“怪”行“怪”事，遍及四方。我们要借鉴他那种“怪”劲，要借鉴身为国民党要员而能布衣粗食、不置私产的精神，面对着粉黛妖姬，而能想起饥寒交迫的老乞丐；身为将领而与士兵共甘苦。当然冯玉祥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人的私与公、本能与伦理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再看看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冯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但这点封建主义的道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冯玉祥还是当之无愧的。也许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吧！至于那些以为“怪”的人，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为没有人能与冯玉祥合得来，是

的，如国民党衮衮诸公，锦衣玉食，娇妻美妾之流诚然与冯合不来。就是正朝着这个方向爬的人，也是与冯合不来的。尤其冯玉祥一生能以坚持学习，那种以学为乐，不屈不挠追求光明的精神，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用于治军、打仗，以及慎独、内省方面，虽囊萤映雪、负薪挂角不足以出其右。故冯说道：“世上一切名利，皆为空虚，惟嘉言懿行能足千古”（《冯玉祥日记》1920年11月27日）。庶几堪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了。

特别是他最后上书蒋介石，指出：“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对台湾当局来说，真乃是一字千金，时至今日，恰如言犹在耳，若能顾全大局，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则祖国之统一大业必当实现，同胞骨肉也可欢聚一堂了。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1949年9月1日为冯玉祥将军遇难一周年，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致悼词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郭沫若的悼词说：“我们要学习他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优良作风。”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家世与童年

冯玉祥的童年是在清苦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家里生计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助大人操作”。冯在七八岁时即“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但在劳动之中却也有着一般童年的欢乐。他在《我的生活》中回忆：“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冯玉祥：《我的生活》10页）在冯玉祥幼小的心灵里，纯洁得透明，明显地留下了“梆子腔”的烙印，在大自然的感应中，把“梆子腔”的形象重复反映出来，自然是充沛有力，弥漫了整个大地，大有气壮山河之势。

当时冯穿的鞋，叫“二鞋”。所谓“二鞋”并不是老大穿完了，老二接着穿的意思。有钱的人家把旧鞋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修补，再打上包头，卖给穷人，因为不甚合脚，所以冯直到晚年脚上的毛病还是不少。还有拔麦子和掰高粱叶子，都

是很艰苦的作业，都是衣服褴褛的农夫所干的事。冯玉祥说：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冯玉祥：《我的生活》11页）但是冯玉祥并不认为这是封建地主造成的。

至于终年当当、粮店赊账的生活也给冯留下了终生的烙印。但这个烙印，不是全面属于贫下中农的烙印，所以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冯认为“过火”了。因为冯的贫困并不是封建地主剥削造成的，而是家有父母二人吸食鸦片之故。按冯父有茂身为下级军官，有十二两银子的月收入，可以维持一个小康之家。以上的劳苦行为满可以不去参加，而入塾读书。说不定就终其生而不与地主阶级为仇。所以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是冯玉祥的特点之一。

农民的生活是干枯贫乏的，与政府的关系只是收税、纳粮，也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农民终年劳碌，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着“哈哈”、“二簧”、“梆子”、“老调”等剧种。冯最爱看的剧目是“老包铡陈世美”一出戏。心情是随着剧情冲突的高涨而高涨，直到陈世美被铡，才一口气松下来。冯不禁自问道：“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何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冯玉祥：《我的生活》19页）每次看完戏都要照例产生如此的问题。冯总是这样的自问着。并且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冯玉

祥：《我的生活》20页）可惜的是冯玉祥只作到了封建主义的清官，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没有作到新民主主义的推行者。半生的行径，走的却是“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做嫁衣裳”，虽然晚年认清了前进的道路，然而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一个人童年的遭遇，往往形成了人生观的主要成分。

冯玉祥的少年生活，在他纯洁的心灵里，注入了少得可怜的思维形象，例如包公案之类的“梆子腔”、“铡美案”等民间创作。这些迎合小农经济的作品，正是冯的朴素要求在舞台上得到满足的机会。因为是创作，并不是现实，所以冯说长大了要做老包。可是当他长大了之后，就不可能也不能去“铡陈世美”这类的人物了，陈世美是不是没有了呢？他在北京、西安、南京、重庆等地，难道不是很多吗？然而那布衣粗食的秦香莲却影响了他一生生活操守，毫无疑问，“正义”是站在秦香莲一边，因而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暗示，因为在他可塑性很大的幼年，即形成了颠扑不破的简单的人生意识。

至于冯玉祥对他童年的生活环境，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有一段真实而典型的回忆：“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主，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唯一的营业。……人民的衣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说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

房’，为村内较好的房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破旧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象一个影子，象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冯玉祥：《我的生活》17—18页）好一幅北方农村的风俗画面，生动地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腐朽的清王朝通过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联合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对内加紧压榨人民，对外则割地赔款，致使山河破碎，鬼魅横行，社会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在这样黑暗动乱的年代和“干枯与贫乏”的生活土壤里，怎样培育冯的海洋般丰富的情感，对友能亲如骨肉，对敌却冷若冰霜的性格呢？

与冯影响最深者当推其父。“公讳有茂，字郁亭。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待兄弟敦睦无间。家贫，初业朽。计所获值奉母给弟，有余则施于族邻之无告者。以故，乡人益称之。……尝奉母携幼妹避难，前阻横溪，不得渡。……乃急寻得大木盆载母与妹，身自扶翼，浮水以济。时，岸上有二女求救。公告母，复返渡之，得免。嗣女父母亦至感其义。……洵人来议婚。公闻知为前所渡女，慨然曰：‘济人之急，义也。以此得婚，人其谓我何？’固辞之。由是义声闻远近。”“同治十年委为铭军哨长……光绪二十三年开充保定练军哨官”。（《冯公墓道碑志》）

这里描述了先人之嘉行，事之可靠与否姑置不论，然于冯玉祥确铭之于心，不敢稍忘。非此一端实委述而不倦者，又说：“公于光绪五年来吾直省，分防京南、良乡、定兴、安肃各县，及突

店、琉璃河各市镇。所在，地方安谧，盗畏民怀。在契店时，值度岁。公犒赏兵丁外，囊中仅馀两钱。方窘迫间，忽有馈钱八缗余者。惊问故，乃欲开赌场，循例致馈者也。公怒曰：‘吾惟不爱钱，故穷。岂反受此不正之赂，纵赌害民耶’？其人惭去。而赌风由此遂绝。”“光绪十八年，奉委督修永定河南段七大工程。先是屡修屡溃。公来，誓众曰：‘苟再溃吾无颜见上官，惟以身殉耳’。乃将合龙，势岌岌且殆，公果跃身入水。急救得不死，而功立就”。（《冯公墓道碑志》）

先人之“不爱钱”、“不怕死”记述颇翔实，然封建法律，治河时主官则与堤共存亡，不成则必死，似乎有些溢美之词。从这里不难看出，其父之言传身教，终其身而不变者却有渊源。

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竹柯村。1882年生于其父随军驻防天津附近青县之兴集镇。不久迁居到保定城郊康格庄。冯兄弟七人，“因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冯玉祥：《我的生活》7页）所以后来冯于1934年回忆当年的生活时说：“前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因吃油条烧饼不会喝牛奶、吃黄油面包颇遭他人的白眼！但是吃油条烧饼就算丢人吗？曾记得我小时候要吃油条，须在父母面前哼哼半天；还有些老百姓说：我当了皇帝一定要整天吃油条！可见油条之贵重，与人民生活之困难。”（冯玉祥：《胶东游记》4页）

冯十一岁时母亲游氏病故。冯事父母至孝。当他训练军队时，尤以封建道德之“孝”作为专题宣扬过，老部下刘汝明在其回忆录中即有多处记述冯为士兵讲解孝道。实践证明，“孝”在封建道德之中并无害处，也是做人的态度之一。

冯玉祥生长在封建而蔽塞、贫穷而落后的农村，然而却不拒绝“读书”这一要求。因其父不识字，一生饱受困窘。另外在冯

所处的时代里，很大的支撑力量全靠“书”这个东西来维系（当然是钦定的）。它的物质外壳——科举制度，更为统治者所重视。对于摸不到这个物质的外壳的人，也可以得到“安贫乐道”的精神安慰。他们宁愿老此一生，闭关自守地安于现状。所以冯玉祥说：“保定府距这里（指康格庄）虽然仅只二里许，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兴趣，有时反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冯玉祥：《我的生活》19页）这就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与“志不在温饱”两种相反相成的思想结晶。

用冯的话说，以“天外飞来的福音”形容读书的幸福与来之不易。因为家无有余资供其上学。恰好其兄道基已经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既然补上兵额，自然就不能上学了。但学费已交每年六吊京钱，至此还有三个月余额，只好由冯玉祥续读了——此即所谓“天外飞来的福音”了。

及至入学之后，不仅未学过“诗云”、“子曰”，只是开蒙的课本“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而且未能入门，三个月即期满了。其后因冯补上“恩饷”，所谓“恩饷”是保定府五营练军的制度，凡未满年龄而能补上名额，领一份饷之谓。并不随营操练，仍可自由活动，因此可以在父亲营房里继续读书习字。因补上“恩饷”而把名字改为冯玉祥，后讹为御香，旋改玉祥。当时补兵之人甚多，管带苗某顺手写了三个字，就叫冯玉祥了。在营中自学，冯不能满足，于是又入私塾学习了一年。学习是刻苦的，家贫不能买笔纸，甚至用麻束蘸着黄泥浆在铁片上习字，为了更加经济又改在方砖上写字。共一年零三个月的学习便匆匆告终了。然而这段暂短的负笈生活，确实是冯终身难忘的。

如果每个人都有黄金般的童年的话，那么冯玉祥的童年就是在“穷困挣扎中”匆匆结束了。但冯却以为“上述家世，正替我埋

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冯玉祥：《我的生活》8页）

行 伍 开 始

1894年，冯玉祥在十三岁时即当上了小兵，历经了练军和淮军两个阶段，于1901年参加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丧失了台湾等大片国土和巨大的民族利益。继之爆发了以革命手段挽救危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想进一步灭亡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冯身为士兵，不能不感到丧权辱国之痛，使少年的冯玉祥产生了幼稚的排外思想。冯曾借“打瘟神”之际，向保定北门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打了两枪，出了一口怨气，把教堂的木匾打得黑了一片。这是冯首次发泄排外心理的爱国表现。

甲午战争前夕，冯随军移防大沽口时，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沙岗的地方与清军对峙，日舰如从这里开炮，正好轰击大沽口炮台，冯目击此情，受到很强烈的刺激，心里无可奈何地想到：“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滋润着他幼小的心灵，对克敌血耻无限憧憬。（冯玉祥：《我的生活》27页）这与冯以后抗日事迹中的矢志抗敌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列宁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列宁选集》二卷221页）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李鸿章投降主义的荒唐可笑的军事指挥，清军在朝鲜战场和黄海之战中同时遭到失败，战火很快延烧到中国的国土上。在这边廷临危、战火纷飞

的时刻，慈禧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当权派，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在黄极殿大事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国事如此，则练军之腐败，冯玉祥更是身临其境。五营练军驻防保定，地处京畿重地，所以清廷下令调练军前、后两营到大沽口戒备时，据冯回忆：“命令一宣布”对“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生活”的五营练军，“不啻晴天一个霹雳”。于是丑态百出，第二天开拔时的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奇哭怪号，声振云霄”（冯玉祥：《我的生活》25页、26页）冯“深恨国事阘冗萎靡，难御外侮”。（李泰棻：《国民军史稿》2页）那里是御敌，简直是送死。练军兵勇的彻底腐烂景象，在冯玉祥的幼小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义和团运动在北部中国爆发，八国联军迫近保定时，五营练军的军用物资未运半数，冯欲坚壁清野，不与资敌，想“将刀枪铁矛捆起来放到井里”。（冯玉祥：《我的生活》46页）当然也于事无补，不过反映了冯的爱国心理。对于保定城内的清廷官吏居然恬不知耻地悬起了八国国旗，冯愤怒地指出：“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冯玉祥：《我的生活》47页）八国联军入侵，使冯清楚地看到清政府之腐朽无能。甚至他还记得当时曾流行的歌谣：“荣禄裕禄碌碌无用，南廷北廷廷廷无能。”进而得出保定练军也是腐败不堪的结论。并将练军之腐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懒惰成性、（二）官气太重、（三）不尽职守、（四）无知无识、（五）缺乏训练等项。

另外，练军的腐朽，也给冯的家庭带来悲剧。其陋规之一即“上衙门”。所谓“上衙门”就是每逢初一、十五各级官吏煞有

介事地穿戴齐备，袍子马褂，高靴缨帽，骑马赴衙，结果大家相见只是请安了事。就在这一例行公式的“上衙门”的路上，冯的父亲因马失前蹄右腿受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恰于此时又接到裁并的命令，而失业南归。造成了父子分离的惨剧，使冯更为切身的体会了练军的腐败。所有这些构成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原因是清王朝的腐朽，这在冯玉祥的思想意识里逐步地形成了。

在此期间，冯最为愤慨者为外国侵略军之血腥暴行。据冯回忆：联军进入保定，第一件事就是杀戳主张用义和团抗击联军的藩台廷雍和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其次是到处拉伕为其负担抢掠来的财物。当时保定三十里内都划为联军驻地，人民不堪其扰，特别是日本侵略军更以活人当靶子，“奸淫的事情，更层出不穷。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岁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奸淫致死的不下一、二百起。”（冯玉祥：《我的生活》50页）八国联军横行杀戳，肆意奴役、凌辱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在冯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根深蒂固的“勿忘国耻”的仇恨火种。

当时作为保定练军大旗手的冯玉祥，面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纵横交错的激烈场面，由于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毒害，头脑中充满了“忠君爱国”的思想，因而也就不可能意识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打击帝国主义、冲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积极作用，反而认为义和团“相信用六个制钱拴在一根红绳子上，放在谁家屋顶上，谁家便要有火灾。”“他们整天拜师练拳，不是说‘我是黄天霸’，就是说‘你是孙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来，刀枪炮弹不能过身，所以他们居然胆敢以血肉之身去挡外人的枪炮。有时令外人可怜、可笑、可怪、也可怕”。甚至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责一股脑儿推到义和团身上，认为义和团“惹起弥天大祸，遂令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推原大祸之所由作，皆从

迷信和愚蠢而酿成。”（简又文：《冯玉祥传》）至于义和团在保定城西利用山地有利地形一举击毙来犯之侵略军46人，在城西北、城南一次杀伤四十名法国兵和全歼一小队意大利侵略者，以保定为中心的冀中义和团斗争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粉碎了八国联军企图进入山东、山西等地的侵略计划，所有这些义和团的积极作用，冯则视而不见，只见其消极的一面，而且这个消极面也是冯才能看到的，这里不能不说冯反映了清王朝中一部分人的看法。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这对于冯玉祥一生的宗教观、政治观不无影响。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五营练军仓促退出保定。冯不肯撤离，当时全营不愿当逃兵的不过30余名，无奈联军占领保定后，冯只得出走。一时陷入了保国无路，有家难归的窘境。几经漂泊，终于得知练军在固安县大宫村集结。口袋中只有100文制钱的冯玉祥，只好跑步来缩短旅程开支，三天的路程只用两天就到了大宫村。不久练军旧部又就编于蠡县。

1901年，残余的练军改编为准军，归李鸿章节制。共编成骑兵、步兵各五营，每营380人，分左、右、前、后四哨，每哨各80人，冯编入元字前营，任右哨教习。

当时准军士兵的生活待遇是清苦的。冯虽任教习，也只能拿到三两三钱的月饷。扣去服装、菜金所剩无几。冯曾说：“三十三天三两三（时月饷以三十三日计）除了吃的不够穿”（李泰棻：《国民军史稿》3页）。士兵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却为冯玉祥奠定了他成为一个良好军士的基础。早在练军时期冯就说过：“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冯玉祥：《我的生活》29页）。而冯的第一个长官刘贺堂、王春恰就是这样的人。据冯回